

产业园区下半场 企业寻突围之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产业园区的发展既有成绩,也不乏挑战。从工业化角度,要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标本兼治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城镇化角度,土地供应正逐步收紧,城市边界也日渐清晰。

从摸索成立 到逐渐成熟

1979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地区开展加工贸易,同年,蛇口工业区建立,我国的产业园区建设拉开序幕。

当时我国工业园区的产业起点低,多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形式承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外来加工业务,由外商提供设备(包括由外商投资建厂房)、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1984年后,随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成立,中国的产业园区进入了开发区与高新区模式的初创探索期及经验推广期。1988年8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开始实施,建设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中关村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在此期间,国家开始在扩大外贸、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方面下大力气。研究产业园区发展历史的行业专家总结认为,这些发展初期的园区,也即第一代

园区的重要特征是以政策为主导,国家投入为主,依托国家产业的划拨带动整体发展。园区各管理主体在行使权力方面具有一定经验,但还不明显,权力运用的酝酿特征明显。

而在“南方谈话”之后,我国掀起了产业园区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新一轮高潮。以张江高科、江苏工业园区为代表的第二代园区逐步建立,园区的一些管理职能开始下放给管理机构,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园区人员精简、办事高效的特征凸显。

这类二代园区的主导产业为低端制造业,由于低端制造业的产业特征是以人口为驱动,因此此类园区呈现向一二线城市市郊集中的趋势。这一时期,园区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不断加大的对外开放速度,二代园区纷纷依靠低端制造业起家,我国“世界工厂”的雏形出现。

但随着园区数量的暴涨,导致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和企业的随意迁移:为了引资,地方政府一再降低土地价格、水电等资源费用和其他税收标准,造成了土地开发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同时,一些企业为追寻最优惠政策而在相邻园区间迁移,导致财政税收的极大损失。

此后,园区开始进入市场化转型与升级创新阶段,民营资本在产业园区领域大展拳脚,国有运营商则对自身进行整合、升级、创新。



从追求增量 到盘活存量

在经过快速发展后,城市发展的目光已从加快城市发展、拉大城市格局的增量型发展过渡到追求如何提高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率,如何引入更适宜的城市功能和激发城市活力,如何平衡利益主体及如何实施规划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而工业园区作为城市中较为特殊的功能片区,其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

这与产业园区发展早期较为粗放的形式有关。初步阶段,为了加快园区建设,在产业招商时放低企业进入门槛,对产业选择目的性较弱,造成园区产业类型混杂,产业集聚效应不够明显,难以形成核心产业,园区定位不明朗,后续招商产业进入恶性循环,发展受阻。

而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园区为加快吸引企业入驻,一般以低廉的土地成本作为招商筹码,往往形成粗放的土地利用开发模式。而且也由于园区管理机制及经验的不足,对企业土地需求监管不严格,造成出让土地规模远超出实际企业需要,企业对用地开发利用极低,形成大量闲置土地,降低了园区综合效益。

此外,此前的工业园区选址一般位于城市边缘地带,不便借助城市现有服务功能设施,而且园区建设更重视工业产业的生产需求,忽视对生活需求,通常只能靠企业内部自行解决,从而形成服务设施规模较小、档次较低、设施重复建设的现象。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201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为我国产业园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方针。

一家产业园区的管理人士表示,“随着演化和发展,传统园区所承载的功能日益多元。大量城市要素和生产活动在区域内并存聚集,园区经济与城区经济逐渐走向融合。”

在经历近40年的快速发展后,产业园区正迎来新的十字路口。产业园区正在不断探索“下半场”破局之道:从过去功能结构单一、产业结构单一、与区域发展脱节、就业人群与消费结构不相匹配的“孤岛经济”转向集生产与生活为一体的新型城市功能区。(来源:中国经营网)

中关村创新大赛 推动分园特色发展

郝艳

以基因测序、自动驾驶、影像筛查、3D打印、锂离子电池、高端芯片等前沿科技为“压轴戏”的第二届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暨前沿大赛优质项目,日前在中关村展示中心公之于众。本次大赛不仅开通了海外赛道,还与分园建立起合作机制,比赛从七大领域扩展为九大领域,以便更好地做项目落地服务。

大赛组委会结合分园城市科技、农业科技、医疗健康、体育科技等特色化发展的定位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海淀、通州、平谷、昌平、延庆等分园区的合作。列入比赛的9个分领域,分别由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中关村硅谷创新中心、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埃米空间新材料孵化器、深圳证券信息公司、牡丹集团等13个特色园区或孵化空间承办。截至目前,接到海淀、通州、平谷、延庆等中关村分园的100多项落地需求,收到来自中关村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等500多家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对接需求,仅北京银行就累计为46户前沿企业,提供8.3亿元融资授信。

俄罗斯成为中企境外 园区数量最多的国家

海外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中企在境外创建的园区超过200个,其中在俄罗斯就有40多个,俄罗斯成为中国境外园区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园区包括农业种植园区、牧业园区、木材加工园区、轻工业品制造业园区和商贸园区等,其中农业种植园区和木材加工园区数量特别多。

俄罗斯地广人稀,耕地很多但劳动力不足,当地的气候等条件也很适合农业生产。而靠近俄罗斯的黑龙江等省是农业大省,种植经验丰富、拥有技术优势,同时又有大量劳动力,这和俄罗斯农业正好形成了互补关系。于是中企尤其是东北企业愿意在俄罗斯创建农牧业园区。

此外,俄罗斯森林资源丰富,一批中企在俄罗斯创建了很多以木材加工为主的园区,如著名的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木材加工园区、俄罗斯耐力木材园区、俄罗斯格城新北方木材加工园区、俄罗斯巴什科沃木材加工园区等。

同时,中企在俄园区中名为高科技园区、石化园区和商贸物流园区的相对较少,目前只有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区俄方园区、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石化工业园和中俄尼古拉商贸物流保税园区等。可见,虽然俄罗斯石油资源丰富,但中企并没有像木材园区那样创建较多的石化园区。

(来源:《中国贸易报》)

文化产业园区:打好特色“组合拳”

从“引资”到“选资”

树特色,园区要聚合竞争优势

“创建文化产业园区,首先要思考你的园区特色是什么,竞争优势又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贾旭东认为,文化产业园区作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与发展的载体,其形成、发展和演化不仅是社会经济形态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直接体现,也是城市空间形象与功能重塑的重要动力来源,文化产业园区必须要树立起自己的特色和竞争优势。

文化产业园区,就是文化企业向一个空间集聚。其实,这不仅仅是在物理空间上的集聚,更应该是向产业链的集聚。贾旭东认为,文化产业园区竞争优势可从三个来源去寻求。一个是价值链集聚,二是围绕着价值链

构建园区的创新链,三是园区服务的体系化。当前最紧要的就是园区建设要从企业的集聚转向价值链的集聚,“我们不是招商引资,是招商选资,我们选择哪些企业入驻,哪些不能入驻,这对于以后竞争优势的形成极为重要。”

从“跟风”到“融创”

铸品牌,依托地方资源推动文旅融合

目前,文化产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各地文化产业园区跟风建设的现象比较突出,不仅文化产业园、时尚产业园、影视产业园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旅游和文化相关的园区也层出不穷,其中不少园区功能雷同、定位相似,在招商、建设、服务等领域陷入同质化竞争。一些专家指出,“可借鉴而不可照搬照抄,因为情况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现有资源的配置以及管理

水平也都不一样。”

文化有文化的传统产业和新业态,旅游有旅游的传统产业和新业态,文旅融合之后应当怎样建设一批文旅特色园区?“比如,可以谋划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园区,把文旅组织架构与园区建设融为一体,形成一批地方特色乡村旅游项目。依托地方资源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文旅品牌项目。”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范周建议,“文化产业园区一定要具有观赏价值,也即旅游价值,这是以后建立园区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从“单打”到“共赢”

抓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前景广阔

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地缘、人缘基础,区域内文化资源丰富多样、各具特色,为三地文化产业园区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基础和广阔协作的前景。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密切三地文化产业园区交流合作,推动文化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杜浩认为,京津冀三地要增强抱团意识,促进区域联动。京津冀都市群的崛起以及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长城、大运河、燕山—太行山三大文化产业带等使京津冀文化产业形成文脉相通、文化资源互补的协同发展格局。

一个充满希望的园区,必然是生机勃勃的园区,是把各种因素都充分调动的沃土。上海德必集团党委书记苏荣指出,除了要加强产业跨界融合外,建议京津冀三地的文化企业在工业、体育、科技、农业、服务、健康、教育等多领域尝试跨界融合,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来源:河北新闻网)